

南方丝绸之路与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^{*1}

邹一清

【摘要】：南方丝绸之路是指从四川成都平原出发，经云南至东南亚、南亚乃至西亚的古代东西方交通网络体系，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、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之一。经由南方丝绸之路，中国文明传播到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及欧洲，对欧亚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。道教文化传播至东南亚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。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的古蜀大地，并很快便传播到了云南、东南亚，其传播的路径便是南方丝绸之路，传播的途径主要包括官员任职传播、官办学校传播、领土扩展传播、汉族移民传播、宗教人士传播、对外贸易传播、少数民族传播、外国朝贡使团传播等。

【关键词】：南方丝绸之路；道教传播；东南亚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 K901 **【文献标识码】：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：** 1008-0139（2017）10-0116-9

南方丝绸之路是指从四川成都平原出发，经云南至东南亚、南亚乃至西亚的古代东西方交通网络体系，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、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之一。经由南方丝绸之路，中国文明传播到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及欧洲，对欧亚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。道教文化传播至东南亚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。

本文将通过对道教传播到东南亚的路径、途径，以及道教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的论述，阐明道教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东南亚的。从道教传播东南亚的事例可以看出，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，沿线各国各族人民都是文化传播的使者。

一、道教的形成及南传

道教形成于古蜀大地，并迅速向南传播至云南、东南亚。

（一）道教形成于古蜀

蜀地发道教之先声，道家的哲学思想自先秦以来就在古蜀大地长期传播，在蜀中的深厚土壤中长期生长，不断发展，到西汉之世，蜀中大学者如严君平、扬雄等，均以精通道学，耽于《老》《庄》而饮誉中华。宋人所说“《易》学在蜀耳”^{〔1〕}，确实真切地反映了蜀中道学思想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。道家思想与古蜀的原始宗教、巫术相结合，在蜀地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，形成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。到东汉时，古蜀大地诞生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——道教。

道教创始人张陵，沛国丰县（今江苏丰县）人，据传汉明帝时曾任巴郡江州（今重庆市）县令，汉顺帝时率家人弟子学道于鹤鸣山（在今大邑县西北）。他以《老子》为经典，奉老子为太上老君，造作道书二十四篇，创立宗教组织，自称“正一道”，又称“无上三天无极大道”，张陵自称“天师”，所以世人称之为“天师道”。入道者交米五斗，能够得到其宗教组织的保护，所以“正一道”又被称为“五斗米道”。

¹ **基金项目：**国家社科基金 2015 年一般项目“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15BZS017）之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：邹一清，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，四川 成都 610066。

张陵创立天师道后，从者如流，为了便于管理，他把教民按地区分为二十四治，实际上就是二十四个教区，蜀郡内有七治，广汉郡内有五治，犍为郡内有六治，越巂郡、巴郡各有一治，汉中郡内有三治，京师洛阳有一治。每一教区设大祭酒、祭酒、奸令、鬼吏等，使其统领教众。其势发展很快，民众以“户”为单位，集体参加天师道，仅张陵在世时，已“弟子户至数万”，声势日益浩大。

东汉时蜀中道家方士甚多，如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杨春卿，广汉新都人，善图谶。”其子杨统“就同郡郑伯山受《河》《洛》书及天文推步之术”。杨统之子杨厚“少学统业，精心思述，修黄老，教授门生。同郡任安，从厚学图谶，究极其术”^{〔2〕}。同书还载有董扶、张霸、翟酺、李固、景鸾、任文公、杨由、段翳等著名的蜀中道学、方术大家。

西晋武帝时，道教流传更广。犍为人陈瑞自称天师，“以鬼惑民”，自设“道治”（设坛祭神之舍），“其为师者曰祭酒”，又置传舍，“徒众以千百数”^{〔3〕}。两晋之际，涪陵郡丹兴（治今黔江县）人范长生在蜀中传布道教。范长生在青城山修道，为道教首领，“善天文，有术数，民奉之如神”^{〔4〕}，有很大影响。成汉李雄克成都后，遣使奉迎范长生，欲推戴范长生为首领，范长生不许，遂拜为丞相。范长生入成都后，李雄又尊其为“四时八节天地太师”，封为西山侯。李雄乃是賁人，賁人信奉道教，所以极为尊崇范长生，“人多事之”^{〔5〕}。东晋元帝大兴元年（318年）四月，范长生卒，年近百岁，“蜀人奉之如神”^{〔6〕}。范长生著有《周易注》十卷，《老子注》两卷^{〔7〕}，均已亡佚不传。由于范长生的影响力，使道教在成汉时期得到很大发展。

及至南北朝时，巴蜀地区推重道教之风依然盛而不衰，以致史籍称述说：“巴俗事道，尤重老子之术”^{〔8〕}，与蜀地相毗邻的汉中地区，也是“崇重道教，犹有张鲁之风焉”^{〔9〕}。至此，道教在古蜀地区已经相当兴盛，形成了鹤鸣山、青城山、峨眉山等著名的道家圣地。

至唐朝，唐朝皇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，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，又在全国各地大造玄元皇帝庙，大倡道教。古蜀作为道教发源地，基础雄厚，从官至民，都竭力尊奉道教。于是，蜀中道教发展到一个高峰，从理论上探讨、丰富、完善道教学说。

（二）道教传播至云南

自先秦时期起，今云南地区便长期深受蜀文化的影响，道教本身又非常契合云南少数民族本土信仰，因此，在张陵创立道教之后，道教很快就向南传入了云南。

在张陵设置的“二十四治”中，有两“治”（稠梗治、蒙秦治）的管辖范围已经延伸到了云南北部，尤其是蒙秦治，其“治”点在台登县，即今之冕宁县南部的泸沽，与今云南丽江相连，故汉末五斗米道势力进入云南西北地区应是无疑的^{〔10〕}。

道教进入云南后，由北而南，逐渐流传。《新纂云南通志·释道传四》据雍正《云南通志》记载：三国时，云南有道士孟优曾驻巍宝山，“素怀道念，常往来澜沧、泸水间，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，随处济人”。表明三国时期，云南澜沧江、金沙江流域有道教人士活动。该《志》又载，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，孟优还以“仙草”治疗蜀汉军士之病。

又据《洞仙传》记载，三国两晋时期，有道士在滇东北活动。朱提郡（今云南昭通）有郭志生修道成仙^{〔11〕}。

在滇东北和滇池地区的考古发掘中，许多汉、晋、南北朝时期的墓葬、碑文都显示出道教文化的色彩，如呈贡孝松山的东汉墓葬、昭通后海子东晋墓，大量的“梁堆”墓的墓壁上绘有道教“四方之神”。著名的《孟孝琚碑》也雕刻有“四方之神”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虽然在道教形成之前就为中国人所崇拜，但却受到道教的极力宣扬和崇奉，成为道教《道门定制》中的“四方之神”^{〔12〕}。立于东晋时代的《爨宝子碑》，碑文中出现了道教的性命难保、灵魂不死等思想。立于南朝刘宋时期的《爨龙颜碑》，碑额上部刻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等，碑文中出现了道教宇宙观、人生观的思想。

唐朝，南诏国虽然以佛教为国教，但对道教也宠信有加，因此，上至皇族下至百姓，兴起了崇道风雅，道教活动较之以前更加活跃。沿五尺道、灵关段分布的少数民族多为信行鬼教的部落^[13]。

南诏神明大士杨波远在苍山、鸡足山、巍宝山等传播道教，这些地方即成为云南道教的中心。只是后来佛教在南诏国取得主流文化地位后，苍山、鸡足山才逐渐演变为以佛教为主。

南诏与唐天宝战争后撰刻成的《南诏德化碑》，其碑文中包含许多道教词汇，如清浊、阴阳、道治、合道、三才、六府等。唐贞元十年(794年)，唐剑南节度使韦皋奉命派节度巡官崔佐时入滇，与南诏王异牟寻在点苍山结盟。苍山神祠现有2005年复制的会盟誓文碑，誓文中包含了道教术语。誓文大意是：请天、地、水、山岳的神灵作证，异牟寻自今归附唐朝。若南诏背盟，侵犯唐朝疆界，愿天神降灾；若唐朝变心，侵害南诏或有难不救，也请天神惩罚。

这些碑文、誓词中的道教术语与典故，反映出道教对南诏文化的影响。

本主教是云南盛行的原始宗教，道教传入云南后，逐渐与本主教相融合，被吸收进“本主”崇拜之中，本主庙中既有本主塑像，也有老子、吕洞宾等道教人物塑像，成为云南宗教文化特有的现象。本主崇拜在云南盛行至今，道家文化影响深远。

(三) 道教传播至东南亚

东汉末年，道教就随移居交趾的士人和当地任职的官员传入越南。

《佛教历代通载》等书记载，“会灵帝崩(189年)，天下扰乱，独交州差安”。牟子奉母流寓交趾。牟子无意仕途，“锐志于佛道，兼研老子”，著有《理惑论》^[14]。牟子广引老子和儒家经书，论证儒释道观点一致，显扬佛学，并驳斥儒生对他的非难。《理惑论》序记载了交州的中原中有为“神仙辟谷长生之术”者，“牟子常以五经难之，道家术士莫敢对焉”。还记载牟子避难于交州，“即修经传诸子”，亦“读神仙不死之书”，后“锐志于佛道，兼研《老子》五千文”^[15]。牟子及其著作是道教传入越南的一个重要资料。

作为当地任职的官员，其行为也为道教的传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，如汉献帝建安六年(201年)，张津任交州刺史时，“津好鬼神事，常著绛帕头巾，鼓琴烧香，读道书云，可以助化”^[16]。“鼓琴焚香，读邪道书”^[17]。

符篆派五斗米道最先传入越南，崇拜鬼神，画符念咒，驱鬼降妖，祈福禳灾，这最能与当地原始信仰与习俗相适应，因此迅速得到传播。东晋末年，五斗米道还参与了农民起义活动，加速了道教的传播^[18]。

至东晋南北朝时期，道教受到官方的优待，在越南逐渐走向上层，出现了炼丹修炼法，表明丹鼎派道教也活跃于此^[19]。到了唐朝，由于道教受到中央王朝的推崇，因而十分兴盛，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。据《安南志原》《交州八县记》记载，当地交州著名的道观就有21所。

道教传入东南亚以后，对东南亚古代文化具有很大的影响，在古代文学方面表现得非常集中。道教的文化要素大量出现在东南亚的古代神话作品中。

越南创世神话《天柱神创世》写道：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地不分，也没有万物和人类，到处是一派浑浊和黑暗，冷冷清清。有一天忽然出现一位巨人。他高大得无法形容……”后来，巨人开辟了天地、平原、山峰、大海、海岛……“巨人成为掌管天地间一切事务的天神，人们称他为玉皇大帝”^[20]。此外还有《男神四象和女神女娲》^[21]、奉玉皇大帝掌握阴曹地府的《阎王》^[22]等等。

柬埔寨神话《金环蛇的故事》说：“柬埔寨语称具有威力的蛇为‘涅克’，即为‘那迦’（龙的意思）。金环蛇相传为高棉人的始祖。”^{〔23〕}《蚊子的演变》说：“玉皇大帝创造了世界上一切动物，而这些动物中，蚊子产生得最早。”^{〔24〕}

老挝的祖先神话《九龙的故事》说：

古时候，有一个部落居住在湄公河流域。部落中有一个名叫迈宁的妇女，她家有九个儿子。迈宁在生第八个儿子后，去湄公河捕鱼。当她下水捞鱼的时候，有一根满是粗糙鳞皮的原木从湄公河上游漂流下来，她来不及躲闪，原木碰上了她的腿。过了不久，迈宁就怀孕，生下了第九个儿子，取名为九龙。九龙一生下来就会走路。一天，九龙跟着母亲去湄公河捕鱼，不多时，有一条蛟龙突然钻出水面，大声向九龙的母亲喊道：“喂，我的儿子在哪里？”九龙的母亲大吃一惊，立即转身跑回家中。九龙来不及逃跑，蛟龙游过来，伸出舌头，反复舔着九龙的后背。此后，九龙聪明过人，力大无比，人们拥戴他为这个部落的首领。从此，这个部落时代繁衍生息，而迈宁的九个儿子就是现在老挝民族的祖先，称为艾老族^{〔25〕}。

此外，老挝神话中还有许多神仙在天上，凡人在地上的描写。

泰国神话《卡维》，描写了从前有修道士、道院，有“方士”具有杀死妖魔、返老还童的魔术，帮助了国王，国王要将国土的一半送给这位方士，方士借口要回丛林修道，谢绝了。^{〔26〕}神话《金螺》的叙事描写中，贯穿着海龙王、修道士、神咒、咒符、升天、天神、神剑等道教文化。^{〔27〕}

缅甸神话《三个龙蛋》说，龙王有个孙女来到人间，产下三个龙蛋，其中一枚青蛋沿着伊洛瓦底江漂到妙香国（注：南诏别称）生出一位公主，一枚白蛋沿着伊洛瓦底江漂到良鸟，被一对骠族老夫妇在良鸟河边发现捞起，送给在杜云山上修道仙人看^{〔28〕}。

此外，包含大量道教文化因素的中国古代小说《西游记》《聊斋志异》《白蛇精记》《封神演义》等也被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等国翻译、流传。柬埔寨在 1860 年还出现了根据中国的《白蛇传》故事改写的古典诗歌^{〔29〕}。

在宗教文化上，道教或单独成为一种宗教，或融入佛教，成为当地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越南同中国一样，大多数寺庙都是佛仙并列，儒释道合一，但也有不少专门的道观，如河内的玉山祠、真武观、玄天观等。越南南方虽然多信奉小乘佛教，但仍有不少专门的道教场所，如胡志明市的庆云南院、穗城会馆、义安会馆等，有信徒众多。

在建筑文化上，尤其是建筑装饰方面，打下了道教文化的烙印。如 8 世纪吴哥王朝建立后，大兴土木建设寺庙及皇宫。在吴哥巴容寺和吴哥窟的窗棂上，雕刻有道教阴阳符图文化的图案。

始建于 1070 年的越南河内文庙，曾经是国子监，科举考试之场所。文庙内供奉孔子及其 72 门徒、越南先贤，但其建筑文化，却包含了道教文化要素，文庙前后共五进庭院，体现了道教“水木火金土”五行，文庙内有进士碑林，石碑座为昂头石龟。殿堂上有许多用汉字写成的对联，含有道教文化意蕴。

泰国的第一级国寺黎明寺，曾经在王宫范围内，作为王室举行宗教仪式的专用场所。黎明寺的大殿四周建有走廊，走廊四角各有一座中国式石塔，塔龕内供奉道教的八仙。而走廊前的空地上有 144 个从中国迎来的文官、武将石像，石像旁还摆有来自中国的花盆、莲缸等物^{〔30〕}，显示出道教文化要素。

二、道教传播东南亚的路径

道教传入东南亚的路径，从古代中外交通来看，可以有三条道路。其一是经北方丝绸之路出境，即由西域经中亚折向印度，

再从印度向东南传至东南亚；其二是经海上丝绸之路，即从合浦、广州或交趾等港口出海，经中国南海沿着中南半岛海岸线西行，传播至沿海各地；其三是经南方丝绸之路，即经云南至东南亚。

北方丝绸之路，这条线路声名显赫，佛教许多僧侣都是沿着此线路交通中印，包括著名的唐僧玄奘。但是，这条道路不当是道教传向印度的路径。因为，在佛教还未传入中原之前，西域各地就已经信奉佛教了，在公元三四世纪，佛教在西域已是根深蒂固，道教的传播不大可能。而在8世纪密宗形成之前，北印度和中印度地区的佛教势力盛极一时，就连本土的婆罗门教都得退避三舍，可以想见，道教即使传入此地区，也难以立足，更不用说发展、传播了。而且，据研究，道教传入印度，首先是进入印度东北部今阿萨姆地区，其路径即是南方丝绸之路，其时代为两晋南北朝时期^[31]，要晚于道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东南亚的时间。

海上丝绸之路，道教在东汉末年即已传播到交趾，那么，再从交州出海，向西航行传播也是有可能的。然而，事实上，从东南亚沿海国家（不包括陆地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及澜沧江—湄公河流域国家）一直到南印度，都没有发现早期道教文化的传播。在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早期文化，如神话传说中，没有发现道教文化因素。道教对印度佛教密宗的影响非常大，是密宗的思想根源之一，但密宗发源、形成于印度东北部，而非南印度，这就否定了道教主要是通过海路向东南亚沿海国家传播。

南方丝绸之路，这条自先秦时期便已开通的东西方交通大动脉^[32]，正是道教向南传播至东南亚的路径。

南方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体系，是由国内段和国外段组成，无论是国内段还是国外段，都有数条交通线，在亚洲南部土地上，以“人”字形展开，共同构成地跨欧亚的古代交通体系。

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地处中国西南成都平原的成都市，从成都向南行，有西、中、东三条主线。西线为：成都—雅安—凉山—楚雄—大理—保山，此后或经腾冲或经瑞丽进入缅甸。此路从成都—大理段称为灵关道（又称零关道、牦牛道），大理段称为“博南道”，保山段称为“永昌道”。

中线为：成都—乐山—宜宾—昭通—威宁—曲靖，此段道路称为“五尺道”，再向西至昆明。

东线是一条水陆相间的道路，从四川经贵州西北—黔南，进入广西西北—桂东，再经广东至南海，这条线路因途经古牂牁地区而称为“牂牁道”，又称“夜郎道”。

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国际大通道，它的国外段也有西路、中路和东路三条。西路即历史上有名的“蜀身毒道”，从四川出云南经缅甸密支那至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以至中亚、西亚。交通线的走向为：缅甸密支那—印度阿萨姆（或因帕尔），向西进入恒河流域，溯流而上，横越整个印度北部，再进入印度河流域的拉合尔，向西经过印度河流域后进入阿富汗或伊朗，再至西亚地区。

中路为步头道。步头道是因道路枢纽步头而得名。步头，古地名，虽然学术界对于古代步头的所在地众说纷纭^[33]，但都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陆分程地点，以下即沿红河下航越南，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道路^[34]。步头道陆路的线路可以分为东、西两条线路，西线：昆明—安宁—晋宁—元江或晋宁—通海—建水，从元江或建水下红河；东线：昆明—弥勒—蒙自（或个旧蔓耗）—河口，从蔓耗或河口下红河。东、西两条线路汇合于红河，之后就顺红河水经河口进入越南老街—安沛—越池—河内。

东路为进桑道。以道路经过著名的进桑关而得名。此条道路起点也是昆明，从昆明至弥勒，渡南盘江，经丘北—文山—麻栗坡进入越南河江—宣光—越池，抵达河内^[35]。

步头道与进桑道在越南越池地区汇合，到达河内后，还可进一步向东通往海防港。

南方丝绸之路灵关段、五尺道，自先秦时期开辟起，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，一直都是成都平原通往云南的交通干线。秦末汉初动乱时期，这两条道路曾经阻断。西汉武帝时期，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夷，阻断的道路皆重新开通，并且在官府的控制之下，畅通无阻^[36]。因此，道教传入云南，无疑是经过南方丝绸之路灵关段和五尺道这两条道路。之后，继续向南传播，迅速进入东南亚地区。

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的进桑道、步头道，直接沟通云南与越南的交通。而且，自秦代起，越南北部（时称交趾）就处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，因此，东汉末年道教传入东南亚地区，最早便是传入越南。

在南方丝绸之路西线，东汉永平十二年（69年），汉王朝设立了永昌郡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说永昌郡其地“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四千六百里”。根据《后汉书·郡国五》记载的，永昌郡治不韦县，下辖八城，其范围应包括今滇西大理、保山以及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。这使得中国文明在这一地区得到广泛传播，道教也得以传播到了缅甸北部。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新开辟了中国西南通往中南半岛腹地的道路，即中国西南通扶南国的民间道路。于是，道教更直接地传播至中南半岛中、南部。

扶南国（公元1世纪~7世纪）是中南半岛上一个地域辽阔的古国，也是中国史籍出现的第一个东南亚古国名，其国土包括今柬埔寨全境、老挝南部、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。扶南国有陆路通往中国的交通线，向东北的交通线路为：从扶南首都特牧城向东北经林邑、日南到中国交趾；向北的线路为：从扶南首都特牧城经扎多木（金边）、马德望进入泰国，再溯蒙河而上至湄公河，继续溯流而上至泰东北高原，再向北进入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、普洱、临沧等地，或者直接从金边溯湄公河而上至中国西双版纳。从中国云南出发南下的角度来看，沿着澜沧江—湄公河河谷便可至扶南国。

道教正是沿着上述南方丝绸之路交通线传播到了东南亚。

三、道教传入东南亚的途径

道教传入东南亚的途径很多，主要包括官员任职传播、官办学校传播、领土扩展传播、汉族移民传播、宗教人士传播、对外贸易传播、少数民族传播以及外国朝贡使团传播等。

官员任职传播是道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，东汉末年道教传入越南，任职交趾的地方官员信教、传教，对道教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如前述的东汉交州刺史张津、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交趾太守士燮、唐懿宗时期任静海军节度使的高骈等，本身就信奉道教。

官府以办学为推行教化的一个重要方式，官办学校传播的汉文化，也包括道教文化。如唐朝剑南节度使韦皋，为了教化以消除隔阂，传播中原文化，在成都办了一所学校，专门招收南诏子弟入校，这所学校办了五十余年，先后入学的学生多达千人，这些人在内地应接受了道教文化，回到南诏后加以传播。

东汉时期、唐之南诏割据时期，都曾有过较大的领土扩张，统治地区曾达今缅北、泰北、老挝等地。道教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而得到更迅速而广泛的传播。

汉族移民，主要有官方组织和民众自发移民两种形式，而躲避战乱是内地民众自发迁徙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官方性质的移民往往一次性迁徙的人口众多，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·永昌郡》载：“孝武时，通博南山，度兰沧水、渚溪，置牂唐、不韦二县。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，因名不韦，以彰其先人之恶。”又如东汉建武十六年（40年），交趾发生“二征起义”，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前往镇压，历时三年。马援大军班师时，有相当部分士兵留居当地，娶妻生子，繁衍后代，悉姓马，称“马流（留）人”^{〔37〕}。

自发迁徙往往是由于战乱因素，持续时间较长。如南朝梁释僧佑所撰的《弘明集》记载：汉灵帝崩后，“天下扰乱，独交州差安。北方异人咸来在焉，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，时人多有学者”。前述牟子就是其中的移民之一。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“夷愈强盛，破坏郡县……会毅疾甚，军连不利，晋民或入交州，或入永昌”^{〔38〕}，其中多数南走交州。

印度的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内地。从其传入之初，就开始了中国本土化的进程，中国文化的一些因素也逐渐渗入佛教。这些中国文化因素包括儒家文化、道家文化及道教等等，其中最主要的是道教。佛教传入中国，曾长期和道教混杂不清，由于道教先于佛教取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，于是后到的佛教便选择了与之相融，共生共荣的策略。佛教僧侣自觉地学习道教思想，将其融合进佛教，以利于顺利传教。中国史书记载，自楚王英至汉桓帝100多年间，黄老浮屠一直并称。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：“楚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。”《襄楷传》：“闻官中立黄老浮屠之祠，此道清虚，贵尚无为，好生恶杀，省欲去奢。”《桓帝本纪》：“饰芳标而考濯龙之宫，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。”同时，在早期翻译的佛教典籍中，也染上了许多道教色彩，混杂了不少道教术语。印度来华传教的僧侣对道教颇有研究，据说著名僧侣鸠摩罗什还曾经注释过《道德经》^{〔39〕}。

随着汉传佛教再传播到东南亚，道教文化因素也得到传播。如东汉末年，中国的佛教人士将汉传佛教传入越南。魏晋南北朝，中国的佛教人士又将汉传佛教传入缅甸。缅甸考古学家杜生浩曾说：“我们不能否认，在公元4世纪时，佛教已由中国传入缅甸。……最早数世纪中，中国僧侣曾在太公（缅甸名德贡）、卑谬和蒲甘等地讲经布道，与用梵文讲授的印度僧侣分道而进。但中国的政治势力较强，因而传授较占优势且收普及的宏效。”^{〔40〕}

对外贸易传播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。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，对外贸易是其重要的内在动力，也是南方丝绸之路最活跃的功能。自从道路开辟之后，各类经济贸易活动就频繁、蓬勃地开展。

对外贸易促使各国人民交往，不仅交流了商品，也交流了文化。而且，古代对外贸易必须走很远的路，待在外国的时间也较长。如南方丝绸之路西线，从永昌至越巂及其以西的地区交易，要渡过怒江，翻越高黎贡山，夏秋山下盆地炎热，冬天山顶积雪寒冷，唐代有当地民谣反映了商贾的艰辛：“河賧贾客在寻传，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：冬时欲归来，高黎其上雪。秋夏欲归来，无那穹熬热。春时欲归来，囊中络赂绝。”^{〔41〕}长时间留居外国，必然传播自身的文化，也包括道教文化。

少数民族是道教有力的传播者，绝不可忽略的传播者。这是因为，道教与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，同时，少数民族向东南亚迁徙直接传播了道教文化。

道教创立于多民族的川西，与川滇各民族关系十分密切，初创时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、习俗，蒙文通先生曾说：“余疑其（五斗米道）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，而非汉族之宗教。”^{〔42〕}闻一多先生指出，道教神仙之说，源于西北氐羌民族^{〔43〕}。向达先生也认为：“天师道祖师张道陵学道于西蜀的鹤鸣山，在今岷江东岸仁寿县境内。仁寿西隔江为彭山、眉山，俱属古隆山郡，是氐、羌族经历之地。故我疑心张道陵在鹤鸣山学道，所学的即是氐、羌族的宗教信仰，以此为中心思想，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。”“南诏之所以信奉天师道，因为这原来是氐族和羌族的本来信仰。”^{〔44〕}

当然，道教还包含很多汉族文化。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与习俗相融合，这就是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得以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东南亚各地的原始宗教，几乎都流行巫术、咒符等，这些鬼巫与天师道类似。如符篆派五斗米道最先传入越南，崇拜鬼神，画符念咒，驱鬼降妖，祈福禳灾，这最能与当地原始信仰与习俗相适应，因此迅速得到传播。还有道教传入缅甸，首先进入上缅甸（即缅北）。上缅甸各族虽然不信奉道教，但流行巫术，因此道教的传播是很容易的。

云南与东南亚的缅甸、老挝、越南等国地缘相接，人民混杂相处，十分有利于道教文化的传播。如东汉设置的永昌郡，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称该地有“闽仆、鸠獠、僮越、裸仆、身毒之民”。民族交往之中传播了道教文化。

东汉末年及以后，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迁徙至东南亚，这些人带去了道教文化。

东汉王朝进军滇西南，建立永昌郡，一些部落便纷纷向南迁徙。如百濮、百越族群多部落组成的哀牢古国“转衰”后，一些部落迁徙至缅甸、老挝、泰国等地，“哀牢这个民族的名称，直到今天还用于越南西北与老挝的老族和泰族，越南人还叫他们为哀牢人。”^{〔45〕}老语中的哀牢意为老挝人的兄长。而迁到缅甸北部的哀牢人建立了掸国。

此外，还有昆明族、哈尼族、阿昌族、傣族等少数民族先后向南迁入东南亚。一些民族在长期迁徙、流动中形成了分布地域广阔的跨境民族，如傣—泰民族。傣族分布地域非常之广，樊绰在《蛮书》中记载，“白衣”（即百夷）部落分布在今云南文山、红河一带以至越南西北部、老挝北部。元代李京在其《云南志略》中说：“（唐时）‘西南之蛮，百夷最盛，北接吐蕃，南抵交趾，风俗大概相同。’白衣、百夷，即傣族先民。‘风俗大概相同’，显示出傣族先民部落逐渐形成一个民族。‘西南之蛮，百夷最盛’，说明其是人口最多、实力最强的民族。这样分布辽阔的跨境民族，是文化快速而广泛传播的使者。

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东南亚一些国家（部落）到中国进行朝贡觐见的陆路交通线。外国朝贡使团由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西南再至国都，在路上要花费较长的时间，而沿途都是道教文化盛行之地，这就使外国使者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、接触道教文化；另一方面，使者们留在国都参观、学习中国文化，也能够接触、学习道教文化。这些使者们回国后，必然也传播了道教文化。唐朝皇帝专门下诏，向觐见之人传播中国文明，如唐玄宗开元二年（714年）诏：“敕：夫国学者，立教之本，故观文字可以知道，可以成化。庠序爰作，皆粉泽于神灵；车书是同，乃范围于天下。自戎夷纳款，日夕归朝，慕我华风，敦先儒礼。由是执于干羽，常不讨而来宾；事于俎豆，庶既知而往学。彼蓬麻之自直，在桑椹之还音，则仁岂远哉？习相近也。自今已后，藩客入朝，并引向国子监，令观礼教。”^{〔46〕}

结论

道教创立于东汉末年的蜀地，很快传播至东南亚，其传播路径便是自先秦时期便已初步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。道教传播者涵盖十分广泛，从身份上看，既有中国的官方人士、民间群众、宗教人士，也有外国官派使者；从民族成份上看，既有中国的汉族、少数民族，也有外国的许多民族。从道教传播东南亚的事例可以说明，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，沿线各国各族人民都是文化传播的使者。

参考文献：

- 〔1〕 宋史·卷四五九·谯定传 [M] .
- 〔2〕 后汉书·杨厚传 [M] . 后汉书·任安传 [M] . 中华书局标点本.
- 〔3〕 华阳国志·大同志 [M] .
- 〔4〕 太平御览（卷123）·引十六国春秋·蜀录 [M] .

-
- (5) 晋书·周抚传 [M] .
- (6) 资治通鉴·卷九十晋元帝大兴元年四月.
- (7) 隋书·经籍志 [M] .
- (8) 壮史·泉企传 [M] .
- (9) 隋书·地理志 [M] .
- (10) 郭武. 道教与云南文化——道教在云南的传播、演变及影响 [M] . 云南大学出版社、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1. 46—48.
- (11) 云笈七签(卷 110)·洞仙传 [M] . 道藏本.
- (12) 道门定制(卷 3) [M] . 道藏本.
- (13) 段玉明. 五斗米教入滇考 [J] . 中国史研究, 1993, (4) .
- (14) 周一良. 牟子理惑时代考 [A] .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[C] . 中华书局, 1963. 288—303.
- (15) (19) 陶维英. 越南历代疆域 [M] . 商务印书馆, 1973. 61, 61.
- (16) 吴士连. 大越史记全书·外纪卷三 [M] .
- (17) 三国志·孙策传引江表传 [M] .
- (18) 晋书·卢循传 [M] .
- (20) (21) (22) (23) (24) (25) (26) (27) (28) 张玉安主编. 东方神话传说(第六卷) [M] .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9. 3, 6, 40, 91, 96, 111, 202, 216, 142.
- (29) 杨保筠. 中国文化在东南亚 [M] . 大象出版社, 2009. 102.
- (30) 覃圣敏主编. 东南亚民族·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、泰国、缅甸卷 [M] . 广西民族出版社, 2005. 212, 215.
- (31) 汶江. 试论道教对印度的影响 [J] . 南亚与东南亚资料, 1984, (5); 张毅. 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 [A] . 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 [C] 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88. 20—27.
- (32) 段渝. 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——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 [J] . 历史研究, 2009, (1) .

-
- (33) 向达. 蛮书校注(卷六) [M]. 中华书局, 1962.
- (34) 童恩正. 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 [J]. 文物, 1983, (9).
- (35) 严耕望. 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 [J].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, 1976, (1).
- (36) 段渝. 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——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 [J]. 历史研究, 2009, (1); 五尺道开通时代考 [A].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(7) [C]. 巴蜀书社, 2012. 41—45.
- (37) 水经注·温水 [M].
- (38) 华阳国志·南中志 [M].
- (39) 汶江. 试论道教对印度的影响 [J]. 南亚与东南亚资料, 1984, (5).
- (40) 高僧传(卷7)·慧睿传 [A];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(卷3)·慧轮传 [A]. 何芳川主编. 中外文化交流史(上卷) [C].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8. 388.
- (41) 蛮书(卷七)·云南管内物产 [M]; 蛮书(卷二)·山川江源 [M].
- (42) 蒙文通. 道教史琐谈 [J]. 中国哲学(第4辑). 1980.
- (43) 闻一多. 神仙考 [A]. 闻一多全集(第一册) [C].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版.
- (44) 向达. 南诏史略论 [J]. 历史研究, 1954, (2).
- (45) 陈序经. 泐史漫笔——西双版纳历史释补 [M]. 中山大学出版社, 1994. 28.
- (46) 宋敏求. 唐大诏令集·卷128 [Z].